

庙会:对神的祈祀与乡民的休闲

——陕北鱼河堡城隍庙会个案

王芳

(榆林学院 中文系,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以对神的崇拜为纽带的庙会不仅是乡民的心理空间更是乡民生活的公共空间。通过参与庙会,乡民将其民间信仰、社会交往、公共生活、休闲娱乐等融为一体,在农忙和闲暇之余充分享受这一独有的休闲生活。陕北鱼河堡城隍庙会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特点。

关键词:城隍庙会;休闲;公共空间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0)05-0053-04

Temple Fair: Worship of God and Relaxation of the Villagers

——A single case of town god's temple fair in Yuhebu of northern Shaanxi

WANG F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lin College, Yulin, Shaanxi 719000, China)

Abstract: The temple fair aimed at the worship of god is not only the psychological space of the villagers, but also the public space of village life.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a temple fair, one can fully enjoy this unique way of relaxation. The temple fair in Yuhebu of northern Shaanxi fully exhibits its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own god's temple fair; relaxation; public space

一 陕北鱼河堡城隍庙会的历史考察

鱼河堡位于榆林南35公里,明正统二年(1437)在今榆林市南鱼河镇九股水处设鱼儿河寨,属绥德卫。成化十一年(1475)迁至今鱼河镇政府所在地,即今无定河与榆溪河汇流处的黑土圪瘩,改称鱼河堡,成为榆林卫36堡之一。明代时,鱼河堡是重要的军事驻地,《延安府志》记载:“城在半山,周三里三百步,南北门二楼,铺十五座,系腹里上地。隆庆六年增修高三丈,万历四年,砖砌牌墙垛口,有分防守备。”又因“鱼河堡多水田,出稻。”加之当地产盐,所以“榆林饷道出鱼河堡。榆林命脉一鱼河持之。”^[1]

据资料记载,明代成化年间,建成了鱼河堡城隍庙,神庭殿宇,展润绚丽,雕龙刻凤,飞檐走拱,其行舒耀,其势巍峨,雄伟壮观。又传康熙十二年(1674),

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康熙皇帝行至鱼河南湾沙头,路遇强盗,是鱼河城隍及时相救,使康熙免于劫难,为表彰城隍救驾之功,康熙赐鱼河城隍半朝銮驾、龙虎月牙旗,正殿五脊六兽阳和瓦及红头伞盖,封城隍为“府城隍”、“灵应侯”。

一直以来,善男信女前来祈福还原,香火不断。由于历史原因,一度时期鱼河堡城隍庙归于沉寂,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百姓自发组织,重修庙宇,恢复庙会活动。近年来,庙会规模日益扩大。

目前,鱼河堡城隍庙形成了融合佛、道为一体的民间信仰空间,全称“榆阳区城隍庙管理委员会”、“榆阳区鱼河堡北门文物管理所”。城隍庙管委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两名,委员12名,常住庙内隐居士两名,管委会兼任文管所全部工作。庙会所辖各村、

收稿日期:2010-07-20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09JK308)。

作者简介:王芳(1977-),女,陕西榆林市人,榆林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农场、各分场部分人员为会长,共 50 名。其中鱼河 8 个村委会,新建村、新立村、农城、党岔阴湾为固定会主。另外下设神事组、文化宣传组、后勤组、灶务组、外事组、治安组等小组以便管理疏通。庙会固定信众 12 000 多人,主要集中在鱼河、横山两地。庙会年收入五六十万元,主要用于寺庙建设维修、庙会活动及建设文化广场。

二 庙会祈神活动

城隍是城镇的保护神,最基本的职能就是保护城镇的安全。但是由于信仰的原因,城隍还有保障治安、判定吉凶、预测生老病死甚至于审理鸡鸣狗盗之职。正是如此,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城隍信仰,到了明代以来规定各府州县必须按照级别修建城隍庙。

鱼河堡的老百姓虔诚地保持着对于城隍的民间宗教信仰,感召到城隍的恩惠,保持着对城隍的敬畏。涂尔干认为:“膜拜的基本构成就是定期反复的节日循环。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理解这种周期性倾向是从何而来的了;实际上,它就是社会生活节奏所产生的结果。只有将人们集中起来,社会才能重新使对社会的情感充满活力。但是人不可能永远集中在一起。生活的紧迫性不允许人们无休无止地聚集,所以,人们只能分散开来,只有当他们再次感到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会重新集合。正是这种必然的交替,才相应带来了神圣时期和凡俗时期的有规律的交替。”^{[2]457-458}

正是如此,鱼河堡城隍庙每年集会要举办三次大型庙会,分别是正月十三至十六一次;五月一次,具体时间不定;八月初一至八月初三日一次。庙会神事活动内容主要有闹社火、唱大戏、做道场、迎贡品、转九曲、放焰火、燎百病、吃神饭,其中城隍出府甚为隆重,是世代繁衍的民俗传统文化活动。

正月的庙会最为隆重,到正月十三日达到高峰。事实上,正月期间的庙会的主要仪式从大年三十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六结束。

大年三十:辞旧迎新,敲钟抽签;正月初一:钟鼓齐鸣,周边村庄及善男信女进庙烧香、上布施,以求一年好运气,这也被称之为“约庙拜年”;正月初二至初七:陆续有拜年活动;正月初八是陕北民俗中的“顺心日”,因此,有许多人来庙里“顺心、扶运”。

正月十三:城隍出府,其全部仪式持续大半天。早上迎供,也就是给城隍上贡摆“献子”。百十人头顶供盘,沿街迎供,再塔下转幡扬幡,在塔底念经。念经回来后给孤魂野鬼们“泼散”东西。贡品一般分为荤

供和素贡二种。一般以荤供为主,有 108 种之多,素供一般 36 种。随后是上供仪式,由会首主持法事,主要内容是给城隍献供。上供结束后,即是声势浩大的城隍出府。

前有仪仗队,后随僧道、吹手、社火,再由 48 人头顶 48 盘贡品,一路笙歌笛鸣,鼓乐齐奏,炮火连天,銮驾(龙虎旗帜、金瓜钺斧朝天镫)林立两行,衙役鸣锣开道,灯官爷执事,体着官服,身骑母驴先行引路。数班社火起舞殿后,一路鼓乐齐鸣,号炮不断,前虎后威,香客街满巷拥,人山人海。巡游结束后,城隍回府,组织僧人等诵经祈福。

正月十四日晚上,在城隍庙内举行灯谜活动。十五日晚上,庙院举办灯会,展灯高悬,有属相灯、花草灯,造型各异,花样甚出,神人共赏,百看不厌。并有转九曲活动,人常说“转九曲,活九十”,不管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争着抢着参与九曲队伍,虽是辛苦也不觉劳累。夜半还有焰火观赏,百挂千响鞭炮骤然齐鸣,声声震耳,礼花升空,五彩缤纷,束束耀眼。十六日晚还有闹社火,搬水船、转九曲,最后是吃神饭,此神饭必须要在庙内所做,由米面豆腐粉条数十种食用料烩做而成,与会者争吃一两勺,意为一年四季无病无疾,脚勤手快,身体健康。据传,古代庙会会期所积攒的食物,会期所用后剩余的各类食品都会供办会执事信众食用,先祖之意是吃“剩饭”。随着时代的演变,乡村也有“吃百家饭”之说。旧时,因医疗物质等诸多因素,导致人口成活率降低,很多信众拖儿带女上百家讨求饭食,一则吃百家饭可岁岁平安;二则难存儿女之户,有“百人保锁,可不生百病,祈保平安”之意。

五月的会期,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迎供、出府、唱龙戏,目的在于祈雨。八月是城隍圣会,会期从初一至初三。也有僧道做皇忏道场两昼夜,并有 3 天大戏助兴。城隍出府阵势与正月十三一样隆重,前呼后拥。所不同之处是此次出府意在围捕射猎,体察阳世间善恶是非,必须要有武士肩挂弯弓,腰悬箭壶,身骑顶马,意在跑马放射先行探路。由于庙会声势闻名在外,四周各县的朝拜者纷纷前来赶会,云集古堡。有商贾交易的,摆摊叫卖的,要手卖艺的,五花八门,凡有尽有,市场繁荣,街巷热闹。

三 对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 因庙会而获致闲暇的交往活动

1 亲缘关系的交往

虽然每年的庙会有着固定的时间,但是庙会前

的多半个月,庙会周围的乡民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捎话”给亲戚。一是显得郑重其事,二是以此计算来人多少准备饮食。庙会前一两天,娘家的大侄子赶着毛驴,驴脊背上垫上崭新的镶边褥子,去迎接嫁到外村的大姑。而他三姨或者二妯子也会拖家带口如期而至,同时还带着菜地里的蔬菜和精心挑选的大红枣等“门户”(礼物)。农家的小院里立刻热闹得如同庙会的会场。大快朵颐后,男人们蹲在墙角抽着自家种的旱烟,聊着收成丰歉、农事安排;女人们争着洗碗,一阵谦让后,其他人都盘腿坐在炕上,拉着家长里短、光景日月。高兴时笑声塞满窑洞,动情时眼泪滚落了一炕。

一般来讲,当地亲戚之间的走动和交往,主要限于“四时八节”或者婚丧嫁娶。其中原因一是因为乡民平日比较忙,二是节日和婚丧嫁娶活动为交往提供了可能与平台。而庙会期间的交往更多的像是一种额外的交往,是一种情感的溢出。如果说,“四时八节”是从时间维度提供了交往的可能,婚丧嫁娶则是从活动的角度提供了可能的交往,而庙会尤其是有着固定会期的庙会则是从时间和活动两个层面为乡民之间的交往提供可能,并且使得乡民愿意为之付诸行动。

2 地缘关系的交往

除了亲缘关系的交往之外,庙会期间由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交往活动也同样被彰显出来。尽管本地有集日,但是庙会更像是被放大的集日,一是“集日”的时间从一天延伸至三天,二是“集日”的内容被扩展,三是平常的集日的目的是纯粹的交易,而庙会则是交往。庙会期间,香客、游人、商贾、贩客云集鱼河,整个街道被人群塞得满满当当。瓜子、枣、油渣、果馅、月饼、炸麻花摆了一溜,炖羊肉、揪片面、各色地方小吃的饮食摊撑起了帐篷,昔日一个钢镚儿掰成两半花的老农也会犒劳一下自己,蹲在街头吸溜着面条子。除了物质的享受以外,乡民因共同的民间信仰聚在一起,更主要的是在庙会期间有着平常集日里没有的娱乐活动,这种娱乐活动变成了人际关系的纽带和润滑剂。即便是不相识的人也会聚在一起,也许是谈及天气、本次庙会与以往的比较或者推心置腹地诉说自己的家事。

(二) 庙会的娱乐

庙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不仅给孤寂、单调的农村生活带来快乐,同时也是乡村的神经中枢。“按照信仰世界的逻辑,庙会旨在复苏神圣存在。在

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神圣存在蛰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表现为常态的凡俗生活……假使神圣存在亢奋不已,人们的常态凡俗生活便会受到干扰;但神圣存在无限沉默,长此以往便会离开人们的记忆。”^[4]从鱼河城隍庙会期来看,一是正月中旬,正是当地农闲之时,正月十五是城隍的诞辰,也是传统的元宵佳节;二是五月,这一时期,虽不算是农闲之时,但是播种完毕,锄务尚未开始的时候;三是八月初,恰好是立秋前后,俗话说“立了秋,挂锄头”,正好是春播夏耘与秋收的间隙。所以首先从时间上具备了所谓的“闲暇”,“闲暇所代表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功利性质,但却是最符合人性的世界,而最根深蒂固的根源是节庆中的崇拜活动,其所赖以支撑的一切莫不是由此而来。”^{[4]69}

“宗教总是日常生活的组织者,而且常常是它的主要组织者。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活动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但是,除此而外,正是宗教塑造了为生存需要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5]101}庙会期间,那红天火地的祈神秧歌,吼天喊地的碗口喷呐,惊天动地的老腰鼓无一不触动每一个乡民的神经;唱大戏、做道场、迎贡品、转九曲、放焰火、燎百病、吃神饭等每一项活动乡民都乐在其中,也把庙会娱乐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岁时节令的补充,也是娱乐精神的彰显。

法国罗歇·苏把休闲实践活动划分为四类:身体娱乐、实用娱乐、文化娱乐和社会娱乐。^{[6]73}庙会所展现的红火热闹,其实正是乡民对于精神文化需求的表现,而对于神的敬畏和敬神的一系列仪式,一方面是精神寄托,另一方面更是在娱神的同时娱人。与此同时,庙会本身就成为不分贵贱、老少皆宜的文化娱乐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乡民得以在闲暇时或者是农忙之余享受难得的休闲。而庙会的娱乐正好包含着身体娱乐、实用娱乐、文化娱乐和社会娱乐。

庙会文化已经根深蒂固的扎根在农村居民的内心世界,而转型时期的庙会文化成为目前西部农村社区文化中最活跃的精神要素,已成为农村社区文化共同体重要的表达形式。尤其农村庙会文化就是乡村文化的一张名片,它即是乡村文化的内容所在,也是乡村文化的载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外出务工的增多,乡村社会自身很难再组织起集体性的文化活动,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弱化。税费改革和乡村体制改革之后,乡村两级组织的权力弱化,乡村社会的集体性活

动难以达成,致使乡村文化建设失去了组织载体。在春节的闲暇时间,农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大家都在看电视或者打麻将,这就迫切需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文化建设职能。

高有朋认为庙会具有四项具体功能:一是娱乐身心;二是文化传播;三是促进贸易发展;四是规范社会即教育民众。^[78]民间信仰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庙宇化和世俗化。世俗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则是祭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庙会活动。庙会期间有祭神的仪式,但更多的则是娱人的活动。“庙会的信仰形式,除了祭祀的香火以外,更为典型地表现在民间艺术上,借以娱神、媚神、酬神,从而娱人、聚人。”^[79]事实上,这种具有双重文化意义的庙会习俗同时还具有其他的社会功能。“村庙信仰构成了社区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间,它不仅具有宗教功能,而且还具有社区公共娱乐、交际与休闲功能。”^[7145]

(三) 作为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庙会

“人一旦丧失了创造闲暇的精神力量,必会沦为烦闷无聊,然后‘绝望’,这个‘不眠不休’的姊妹,也将一并乘虚而入。”^[8145]因此,乡村的生活需要一种在闲暇之时的文化生活,而乡村公共文化生活源于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许多场所可以成为公共空间,例如,寺庙、戏台、祠堂,甚至村头、水井附近、小河边、场院、大树下等。人们自由地聚集在这样的场所,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因此,公共空间是村落中人进行精神交流的共同场域,这种精神交流在大集体的政治性社区解体,村庄分解为原子化状态,稀缺的行政性集会又日益对村民的利益需求脱节的情况下,更是需要寻求一种表达的场所。乡村公共空间活动组织与农村文化建设不是个人或家庭可以建设的,它需要乡村社区内全体居民的公共参与,而公共空间为人们的共同参与提供了场所。人们在公共空间中形成的共同意识、共同形式,往往就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之中认同的地方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庙会给人们提供了群体狂欢的场所,百戏杂耍

则成为人们释放心灵、愉悦性情的节日盛宴。”^[468]

同时,庙会还是一种在村庄基础上扩大了公共空间。庙会这种古老而鲜活的社会文化现象把世俗与宗教熔为一体,长期积淀了农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心理态势,并表现为一种世代延续、传承和发展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庙与会结合所形成的组织形式。一般来讲,庙小会大,庙是一个点,会是一条线,一点一线连成一大片。事实上,在陕北农村,村村有庙,庙庙有会,依地缘结构,经济往来,人情关系,文化制约,共同信仰等因素,小至三五个村一会,多至几十个村一会,不入会的村子被人所看不起。由于城隍庙的存在,以庙会为纽带,具有相同民间信仰的八个村落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村落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具有社会整合以及消除疏离感的功能。城隍庙村落共同体包括:举办庙会时各村派人分担庙会的劳务,各村派“代表”共同维持庙会的日常管理。正是如此,这八个在行政区划上相互独立的村子就像一个扩大了公共空间或者“社区”。

参考文献:

- [1]孙承泽.春明梦余录[O].内府刊本.
- [2]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3]小田.休闲生活节律与乡土社会本色——以近世江南庙会为案例的跨学科考察[J].史学月刊,2002(10):47-51.
- [4]约瑟夫·皮珀.闲观:文化的基础[M].刘森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5]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6]罗歇·苏.休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7]高有朋.庙会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8]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